

#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旅行

## ——陈望道的波格丹诺夫翻译及其语文理论的实践

高维宏

**内容提要** 1928年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军事、政治斗争转为隐蔽战线、文化战线斗争。彼时苏联则已进入斯大林时期，然而这一期间陈望道并未翻译马列的经典理论，而是选择通过日译本翻译波格丹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与《无产阶级文化》杂志，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社会意识论、文化组织论等观点，运用于现实的大江书铺组织工作、大众语运动，并且将之改写，融入其修辞学代表作《修辞学发凡》之内。梳理这段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从苏俄、日本旅行至中国的过程，有助于厘清日后的文艺组织生活的理论源头与改写过程，补充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实际系谱。

**关键词** 陈望道；波格丹诺夫；无产阶级文化派；文艺组织生活；文化战线

因为经历了“四·一二政变”及之后多次武装斗争的挫败，1928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重要力量从军事、政治斗争转向了隐蔽战线和文化战线。文化战线斗争意义近于葛兰西所言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通过弘扬无产阶级文化意识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进行斗争。但在“左联”成立以前，左翼知识人尚在进行相关的理论探索，其中一种主张是后期创造社运用福本和夫的理论斗争，例如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对鲁迅的批判，但是这种“分离”出先进分子的斗争方式反而使左翼的力量难以整合。因此陈望道评论此时期“国内学者文人新近分化甚烈，交战亦杂”<sup>[1]</sup>，而希望整合国内的知识群体。在这段时期，陈望道的文化组织与翻译工作并行。1928年陈望道筹措资金成立了大江书铺，成员包括中共党员和党外进步知识分子，如鲁迅、丰子恺、冯雪峰、方光焘、夏衍、谢六逸、傅东华、叶圣陶、茅盾等，大多参与了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同时他着力译介日本和苏联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对此，陈望道1961年在《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以“尊崇马列主义”概括自身1928年后的文艺工作，陈望道的自我言说也成为前行研究的普遍前提。

然而若是回溯此时期陈望道的翻译工作，将会注意到陈望道所选择翻译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列主义，而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如《社会意识学大纲》以及《无产阶级文化》杂志的相关文章。1928年至1929年，陈望道通过林房雄的日文译本，转译了波格丹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由大江书铺出版，之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冈泽秀虎的《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的译文，其中最主要介绍的同样是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以及他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运动”。在《社会意识学大纲》译者序中，陈望道盛赞波格丹诺夫以及此书。序言内提到从1928年2月开始翻译此书，至10月完成。关于译本的体例，陈望道谈道：“（1）插画，（2）脚注，（3）索引——这三项是我们所加，为德日文的本子所原来没有。日文本是林房雄氏底手笔，可惜颇有误印处……”<sup>[2]</sup>陈望道参照德文本修正了日文本的错误，加上这些补充后全文总共达462页，即使放置在陈望道一生的翻译文本之中，该书也可说是投入心血很多的一部。

但是陈望道1928年所翻译的波格丹诺夫，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将之批判为经验主义、马赫主义。因此笔者希望探究的是，

为何 1928 年至 1929 年的陈望道会热衷于翻译彼时苏联马列主义的“异端”思想？以及此时波格丹诺夫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如何？陈望道又如何将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与其自身的文学观相结合？

前行研究中，如艾晓明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中提到了此时中国左翼知识界并没有在“波格丹诺夫的艺术论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论中划出界线”，艾晓明更进一步提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理论的影响一直没有被肃清”<sup>[3]</sup>。由此也可知艾晓明延续了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理论的批判。这种看法并非孤例，自 30 年代后我国知识界开始对波格丹诺夫进行批判，到了 70 年代至 80 年代，评价的措辞之严厉已经超越了学理上的批判，如姜淑霞称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野心家、两面派，和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sup>[4]</sup>。哲之批评“他们屈服于沙皇反动政府的压力，适应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联合起来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头子就是波格丹诺夫”<sup>[5]</sup>。随着苏联解体，1991 年年底波格丹诺夫与列宁论战的重要评论《科学与信仰》被重新发表<sup>[6]</sup>，对波格丹诺夫的批评也已不再如此严厉，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谈及波格丹诺夫时大多仍持列宁的批判立场。

于是，长期以来谈论 20 年代波格丹诺夫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接收时，也就只能以苏俄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对其进行评判，而未能顾及中国在地理论旅行背景。关于波格丹诺夫的研究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情况，胡一峰称之为“沉没的声音”<sup>[7]</sup>，并且梳理 20 年代的中国知识人如

施存统、张伯简、周佛海、彭述之对波格丹诺夫的翻译工作。但胡一峰以较多篇幅探讨施存统翻译《经济科学大纲》的大要与交由大江书铺的出版过程，全篇却未提及与此书一同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这两个译本分属波格丹诺夫前后期著作的理论，前者偏重论述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后者则探讨在此生产模式之上的社会意识的构造。陈望道与施存统都在各自的序言中建议读者阅读时将这两本书互相参照<sup>[8]</sup>。陈望道翻译波格丹诺夫的工作之所以被忽略，或许也在于比起专注于分析物质生产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则被认为涉及更多马赫主义认识论，直接与苏联斯大林时期官方学派的认识论相悖。但需要赘言的是，本文并非要评价两种认识论的优劣，而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史化地梳理此时期的陈望道如何通过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结合自身的知识资源与历史经验，开展中国在地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

## 一 《社会意识学大纲》所据原本及其翻译取径

或许因为波格丹诺夫与列宁之间在政治与哲学上的冲突，以及日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在苏俄的式微，在陈望道的众多译作中，《社会意识学大纲》一书未被前行研究与陈望道自身所谈及，因而长期淹没于历史之中。于是，陈望道的重译所依据的德、日文版出处，以及波格丹诺夫所著原文本的体例仍需进一步加以考订。因此在本文开展论述前，

《社会意识学大纲》的原本与各种译本

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年	备注
Наука об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 вопросах и ответах	波格丹诺夫著	1923	附有作者序，书名附有提示体例的副标题。直译为“社会意识科学：意识形态问答的短期教程”。
Die Entwicklungsformen der Gesellschaft und die Wissenschaft	J. Dürsky. 译	1924	翻译自俄文原著。附有作者序，书名无副标题。直译为“社会意识科学的发展形式”。
社会意识学概论 <sup>[9]</sup>	林房雄译	1927	翻译自德文版本。附有作者序言，书名无副标题。
社会主义社会学 <sup>[10]</sup>	萨孟武译	1929	去掉了作者序言。附索引与插画。翻译可能是以日、德文版为主 <sup>[11]</sup> 。标题把社会意识翻译为社会主义，与原文差异较大。
社会意识学大纲	陈望道、施存统译	1929	去掉了作者序言。附有译者序、插画、脚注、索引。翻译以日文版为主，参照德文版勘误。

有必要整理出陈望道《社会意识学大纲》一书翻译与重译的各国版本，以及同时期的另一中文译本，将各版本之间的差异简要列表如下：

中、日、德、俄四版本之间标题略有变化，但意义差距不大。德、俄版本的目录列在卷末，中、日版本列在卷首。陈望道的版本与其他各版本之间在体例上的较大差异是新增了插画、脚注、索引，此外最重要的不同是删去原作者五页篇幅的《作者序言》，而更换为陈望道所写的《译者序言》。为了进一步探究陈望道“改写”的原因及其意义，笔者先梳理《作者序言》与《译者序言》之间的异同，并且进行简略的思想概述与思想史的考察。

在《作者序言》中，波格丹诺夫谈到自身“意识形态理论”的概要。他的论述以“意识形态源自于物质生产，是经济生活中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共识作为起点。但是在进一步推论时，他并不认同过往的马克思主义只把“意识形态”当作次要——也就是“分析意识形态总是只从劳动与经济生产的条件寻找原因”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此，波格丹诺夫援用考茨基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以及路德维希·诺伊累<sup>[12]</sup>的语言学理论，其中提到“人类言语和思想的起源”是“原始社区人们的共同协作”。

于是波格丹诺夫在“基础——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加入了“语言”的要素，他的论述可表述为物质生产产生了语言，而语言构成集体文化即意识形态，因此语言文化在物质生产与上层建筑之间具有“组织”的作用。波格丹诺夫不只是认为基础能影响上层建筑，也认为精神文化的上层建筑能够影响物质生产。对此，波格丹诺夫曾把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之间关系，譬喻为“大脑控制身体”，并且论述“意识形态”具有“组织”的力量，是“组织社会、生产、阶级以及一般社会力量或要素的工具”。于是波格丹诺夫的“文化（意识形态）组织理论”可说已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古典马克思理论具有相当的差异，而较倾向于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列宁与之展开了争论。

那么陈望道又是如何看待波格丹诺夫与列宁对“意识形态”性质的争论呢？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序言》突出了波格丹诺夫理论之中的“语言”议题，

沿用了《作者序言》之中同样提过的诺伊累的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和技术的关系”“语言的组织作用”及“语言等于思维”的语言对思维的“强决定论”。但与《作者序言》不同的是《译者序言》避谈了《作者序言》之中所说的“意识形态”如“大脑控制身体”般的决定作用。概言之，陈望道不去谈《社会意识学大纲》之中相异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把它当作分析“社会意识”“精神文化”的研究方法，重视其组织的理论，而未提及波格丹诺夫哲学上的经验论倾向。

此外，相较于前一个月出版的萨孟武版本，陈望道与施存统各自在《译者序言》中把《经济科学大纲》和《社会意识学大纲》作为互相对读的“姊妹篇”，这也是陈、施版本的特殊之处，但这种解读方式可能来自日文版本。施存统自述从1925年“五卅”运动后开始翻译《经济科学大纲》，“最初根据的是赤松克磨底日译本，后来是林房雄底译本”，修改时则“对照英、日两种译本”。陈、施二人延续了林房雄先后翻译《经济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的思路，将两个文本对读。这种解读方式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两书的原作成书年份其实差距甚大，《经济科学大纲》出版于1897年，《社会意识学大纲》则在1923年发表。再者是从1897年到1923年之间，波格丹诺夫理论关注的倾向已发生变化，分析的重心从经济、技术转为语言、意识形态，列宁对其理论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 二 从《经济科学大纲》到《社会意识学大纲》——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变化

陈望道与施存统“姊妹篇”的对读法，涉及1897年的《经济科学大纲》到1923年《社会意识学大纲》所反映的波格丹诺夫一生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思考历程，以及两本著作期间，列宁与波格丹诺夫从合作走向决裂的过程。为了更清楚呈现陈望道理论翻译的脉络，本节试图概述两部著作出版之间波格丹诺夫所提出的重要理论，以及列宁对此的解读。

通过梳理《列宁全集》并对照当时俄国的政治事件，笔者认为列宁与波格丹诺夫之间哲学、政治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大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1898年至1903年间，两人在政治与哲学两方面都合作的阶段，施存统所翻译的《经济科学大纲》就是此一时期的代表作。《经济科学大纲》出版不久，1898年列宁就写了书评加以评论。简述此书大意并且评价：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主要优点，在于这本书论述的问题多而且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作者一开始就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

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它们非常狭隘和缺乏联系地去理解各个经济问题的意义，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sup>[13]</sup>要言之，列宁肯定了此时期波格丹诺夫的论述方向，原因在于认为这是一本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代表著作。

第二阶段则是在1904年至1907年间，两人在哲学上逐渐产生分歧，但政治上保持合作。陈望道所翻译《社会意识学大纲》的理论前身，正来源于此时波格丹诺夫所著的《社会心理学》和《经验一元论》。这两部著作使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波格丹诺夫之间存在哲学上的分歧，但因为两人在政治上同为布尔什维克，因此暂且搁置了争议<sup>[14]</sup>。此时布尔什维克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孟什维克，政治立场的问题优先于哲学立场，其中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场景是波格丹诺夫送给列宁《经验一元论》时，列宁送的是《进一步，退两步》，后者强调严密的党组织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的回赠或许是因为预见了两人的未来政治分歧<sup>[15]</sup>。

第三阶段在1908年到1917年间，两人在哲学与政治上的分歧都尖锐化。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等人在1908年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对唯物主义的党派性展开攻击，列宁批判波格丹诺夫所言的经验批判主义“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既不主张社会主

义，也不主张自由主义”，并且反对《社会心理学》《经验一元论》之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sup>[16]</sup>。不只是哲学，政治上两人同样走向殊途。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沙皇试图通过成立“国家杜马”安抚人心，1907年沙皇与总理大臣斯托雷平策划六三政变解散国家杜马，并且逮捕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布尔什维克内部就是否继续参与议会工作展开激辩，此时波格丹诺夫领导前进集团反对合法、半合法的组织工作<sup>[17]</sup>，主张从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因此称为“召回派”，列宁称召回主义为“来自左面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sup>[18]</sup>。随着列宁为主的派系在党内斗争中占优势，波格丹诺夫逐渐退出政治领域，将精力转向文化理论的研究。

第四阶段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此时布尔什维克刚夺取政权、签定了德战争和约，随即国内爆发红白军内战。面对内外交困的新局势与共同的敌人，列宁与波格丹诺夫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领域上展开合作。列宁在1918年9月的信中指出目前工人仍然不够组织化，因此“希望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能在这方面予以协助”，使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苏维埃来管理国家”<sup>[19]</sup>。此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经费来自教育人民委员部，名义上受其管辖，但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之后协会更通过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主张“完全自治”。因此列宁在1920年10月对其进行批判，重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属于后者”<sup>[20]</sup>。波格丹诺夫正是在这一期间担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以及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与共产主义学院主席，也在此时写作了《社会意识学大纲》。

### 三 从文化组织论到语言组织论： 陈望道对波格丹诺夫理论的运用与改写

陈望道与施存统把《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对读的方式，并没有考虑到这两部理论在苏俄被列宁视为遵循着不同思想体系的著作。与《社会意识学大纲》的文化论更为贴近的是波格丹诺夫1922年的《组织形态学》，以及1924年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1904—1924年》。那么，《社会意识学大纲》一书的语境为何？陈望道为何采用与《经济科学大纲》的对读方式？

《社会意识学大纲》之所以强调“文化组织论”，原因在于“一战”时欧陆各国的工会领导人没有坚守工人权益，“带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倾向，向着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动摇”<sup>[21]</sup>，工人被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组织，参与互相残杀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一战”时工会组织的失败，列宁主张需要以具有共同政治目的的工人政党组织工人，波格丹诺夫则是试图在工会、布尔什维克政党以外开辟另一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陈望道删掉的《社会意识学大纲》的《作者序言》中，作者谈到了其文化、意识形态组织理论：

意识形态是用于组织社会、生产、阶级以及一般社会力量或要素的工具——若是没有它，所有的组织都是不可能的。在某一阶级中帮助发展意识意味着发展其组织的基础，参与控制这种强大身体的大脑的形成。<sup>[22]</sup>

《社会意识学大纲》之中提到“社会意识可以简称为意特沃罗几（Ideologie）”或是“文化（Kultur）”“精神文化”。波格丹诺夫认为在社会组织过程中“文化”具有关键作用。他以“一战”时德国的“举国一致”为例，说明这全然是“劳动阶级底精神的奴隶化底实际的表现。还有，这是意特沃罗几底社会的组织的剧目底极明了的一例”<sup>[23]</sup>，而劳动阶级之所以精神奴隶化，就在于他们没有自身的文化。

在列宁看来，波格丹诺夫的文化组织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颠倒，是“经验主义”，陈望道翻译后我国知识界也围绕《社会意识学大纲》进行了讨论，不过却是从“机械论”的角度加以评判，这可能是受到陈望道对读法的影响。例如1932年《上海青年》上姚铁城所采用的对读方式：“波格丹诺夫所著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经验一元论》这三部书，是三位一体的”，“在社会进化的程序上，本书与《经济科学大纲》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并且认为“把力学上的机械观点，把物理学上的唯心论——力量因果性，整个地搬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意识学的领域来，这是波氏的根本谬误之一”<sup>[24]</sup>。类似的评论也见于柯柏年

主编的《书报评论》：“根据他形式逻辑，机械论的方法，所得到的直接运动的规律，就造成最著名也是最不正确的组织作用论。”<sup>[25]</sup>这类批评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分析方法套用至文化理论。

虽然文化组织论在苏俄与中国都遭受批判，但是将《社会意识学大纲》以更倾向于唯物论、甚至被批评为机械论的方法加以解读，显现了陈望道将文化理论与政治经济理论连贯的用意。在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意识到开展“第三战线”，也就是文教战线的必要<sup>[26]</sup>。因此引入波格丹诺夫的文化组织理论并进行部分改写。《作者序言》中多次出现的“文化组织”这一关键词，在陈望道的《译者序言》中却仅用于“语言……为组织技术的及经济的过程所不可缺的要素”<sup>[27]</sup>。可能正是因为原文的“文化组织论”违反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自治”主张与党直属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发生了“文化领导权”的争执，因此被陈望道改写为“语言组织论”。这种改写既避免了波格丹诺夫理论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的问题，也与陈望道自身的语文改革主张更为契合。陈望道同样在自身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中内化了波格丹诺夫的语言观：

（语言）发生的因缘，大概由于人类的共同劳动。从共同劳动的呼声中，发展起来。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工具。

（杜甫《兵车行》）这类的写说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最密切；受社会意识的浸润也最深。<sup>[28]</sup>

上面这段引文并未出现于1930年前写就的《修辞学讲义》，而是出现在翻译《社会意识学大纲》之后1932年由大江书铺出版的《修辞学发凡》。《社会意识学大纲》之中写道：

（语言）从劳动底呼声中发生。

语言原是从人类底共同劳动生产中发生的。

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意识底效能在乎将生物（人类及动物）底生活加以组织化。

（语言）它是生于共同劳动，并非生于个人底意识的。<sup>[29]</sup>

陈望道将《社会意识学大纲》的观点理论表述为《修辞学发凡》中的“语言起源于劳动”“语言组织论”。在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中，陈望道又

再次运用波格丹诺夫关于语言、社会意识与文化遗产的论述，这一次的语文论述不只是涉及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论战，更牵涉到当时左翼知识界对于语言改革以及文化遗产问题的争论。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有必要从陈望道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翻译回溯当时的语境。

#### 四 围绕《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化遗产问题与陈望道的文教战线实践

过去我国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负面看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围绕“文化遗产”问题的争论，例如马龙闪梳理了1922年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

以普列特涅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方面高谈阔论“创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一方面却拒绝继承过去时代的旧文化，而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被“净化”的“实验室”中，通过文化创造的实验来制造这种文化。<sup>[30]</sup>

目前我国学界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评价大多沿用了与此相似的论述。但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文化遗产的认知，使得前行研究者难以解读此时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翻译，如白杰、李标晶等研究者只能将矛盾的译介视为误读。此外，这些前行研究虽然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却未追溯引用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波格丹诺夫自身的理论原典。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原典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机关杂志《普罗列塔利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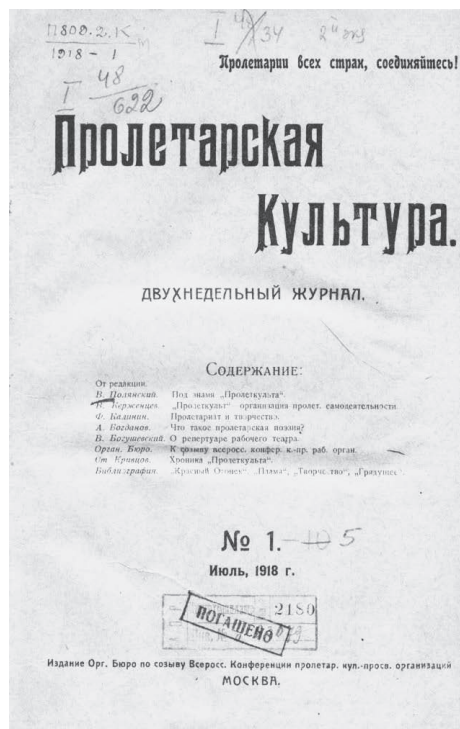
对此陈望道通过冈泽秀虎的日文版全译了1918年波格丹诺夫执笔的《编者言》，阐发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主题，认为只有“将独立的精神文化完成起来”，才能使劳动阶级抵抗“各国布尔乔亚阶级——世界资本主义——底指挥”。其文化建设的主张，并非拒绝文化遗产：

新的文化必须包含生活和创造底所有范围。而且必须不是表面的部分的，而是深且广泛地包含着它。

真的阶级自立的战斗……是旧世界底一切有价值的战利品（连精神带物质的）底正当的继承，他不能谢绝这遗产，也不应谢绝这遗

产，不过他须注意，不要像死资本掳了布尔乔亚底魂模样掳了他底魂，应该单把它取来，做自己手中的武器。<sup>[31]</sup>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另一位主要成员加里宁在《普罗列塔利亚文化和布尔乔亚文化的路》一文中同样提到“普罗列塔利亚特不可不将过去文化所已到达的所有东西弄到手……但又不可不经批判地摄取了来，在自己阶级意识底熔炉中加以改造”<sup>[32]</sup>。若是熟悉我国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的读者，可能会对这段宣言感到诧异。因为其中对“文化须包含生活与创造”以及“文化遗产批判性的继承”的观点，反而与列宁的主张无明显区别。笔者根据陈望道提供的线索：“这篇宣言虽然用编辑者之名发表，实际上是波格达诺夫底手笔”<sup>[33]</sup>，考察冈泽秀虎翻译所据的苏俄文献原典，列出出处如下图1，并做部分简要的说明：



《普罗列塔利亚文化》俄文原版

本期收入了波格丹诺夫署名的文章《何谓无产阶级文化？》，这篇文章与《编者言》都是研究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的重要文献。陈望道所用的冈泽秀虎译本，其原文出处即为上述创刊号的《编

者言》，《编者言》分为十个段落，与陈望道通过冈泽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部分来自原文第八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提到“世界社会主义”（Мировому Социализму），开头是“朝着我们伟大的目的全世界社会主义”，结尾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伟大的武器普罗列答利亚文化万岁！”<sup>[34]</sup>波格丹诺夫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民族国家战争的情况，为避免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相残，因此他有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构想，却有悖于1924年苏联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不符合日后苏俄集中力量于本国建设的现实需要。

陈望道之所以还是在1929年继续翻译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在于中国与苏俄不同的文化、政治语境。1920年时的苏俄已逐渐平定内战，列宁重新考虑战后苏俄的文化、教育建设，与无产阶级文化派产生文化领导权的冲突，列宁于1920年10月的《青年团的任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二文提到：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

坚决地反对……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sup>[35]</sup>

应该注意到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创始之初的1918年与日后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主张之间发生了变化，其理论变化的原因很可能是希望使协会独立于党的领导以外的政治因素，而非思想上的根本歧异。例如陈望道翻译冈泽秀虎的文中提到，“1925年7月发表的党底文艺政策也是具体地显示着‘普罗列特卡尔特’底理论原是正确。列宁所以批难‘普罗列特卡尔特’，乃在它底组织方面”<sup>[36]</sup>。以及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政治上是想“离开国家机关的组织”以掌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sup>[37]</sup>。1920年列宁反复强调的是无产阶

级文化派需要遵从党组织的领导<sup>[38]</sup>。

陈望道并非不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领导权的冲突，例如他的翻译相较于列宁，陈望道是将其文化理念与领导权问题分而视之，翻译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没有一定得靠“自己底运动才能成就普罗列答利亚精神文化一类的傲慢的思想”，他引用1918年培斯舍里珂所写的《普罗列答利亚文化底意义》阐述了内战后才能有真正的文化建设：“红军从战争归来的时候，劳动者和农民征服了饥饿的那时候，我们底文化，我们底艺术，才会满开的罢”<sup>[39]</sup>。过去的研究常以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评为线索，认为他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却忽视实际的无产阶级的教育问题。而无产阶级文化派创始之初，列宁也有着与之合作的期望，1918年9月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中提到希望在工人教育“这方面予以协助。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取得成就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sup>[40]</sup>。陈望道翻译加里宁在《普罗列答利亚文化》创刊号中提到：“凡是肯做劳动阶级帮手的人，大概无论什么人都会不会否定教育问题底重要的罢，我们劳动者不能将国民教育放弃在布尔乔亚方法底支配之下。”<sup>[41]</sup>可知无产阶级文化派并非不重视教育，而是反对“布尔乔亚方法”的教育方式，如加里宁所说“必须产出可与社会主义底理想直接连接的，独自的社会教育法”<sup>[42]</sup>。

对于这种教育法，列宁在1920年3月时谈到：“如果我们可以用那些脑子里没有装满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这倒是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sup>[43]</sup>从苏维埃执政的实务角度批判了加里宁过于左倾的主张。双方看法的差异也在于场域位置的不同，无产阶级文化派身为在野力量，其立场和理论观点较为激进，列宁则是考量到此时内战方歇、苏维埃政权的脚步还未站稳，因此他说“若要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坦率地承认，我们还非常不善于经营管理，不善于当组织者和管理者”，因此要“善于组织资产阶级专家去参加即将开展的运动”<sup>[44]</sup>。

固然列宁的论述符合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维埃政权的国情，但对于1928年中国的陈望道等人而言，大革命的失败早已粉碎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

可能性，因此反倒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左倾”的理论更符合此时左翼知识人的现实需要。与波格丹诺夫类似的是，陈望道同样与党配合在党外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陈望道回忆：

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开一大时，我声明不参加党，但一切严守机密，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了。以后我参加过上海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的工作。这两所大学，是在党领导下办的，也都有保护色。起先我不愿去上海大学，陈独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要我去工作，说教师全力支持，署名“知名”。<sup>[45]</sup>

陈望道叙述当时上海大学中文系“左的右的（有西山会议派）各一半”，社会系“大都是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成员和理论家”，“中华艺术大学的文学系是党办的”。面临政治与军事战线低潮的时局，陈望道翻译波格丹诺夫的文化、教育理论，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因此不同于苏俄无产阶级文化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围绕文化领导权的矛盾，其理论更适用于与国民党政府争夺陈望道所言的文教战线的现实需要。日后陈望道经历了波格丹诺夫所言的“布尔乔亚方法的教育方式”的问题，1934年，汪懋祖、许梦因等文人鼓吹文言复古、小学读经，陈望道以《太白》为主要据点发起大众语运动与之斗争，但他并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1934年的《建立大众语文学》一文中再次运用了波格丹诺夫的理论：

话和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创造是随了社会的需要来创造。

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离开社会意识空洞地争论文白的问题，是要关联着社会意识来检讨话文包藏着过去社会的遗质有多少，新的生机有多少，现在话文有什么缺点应当改正……

离开社会意识争论文白，就不能说明大众何以能看而且欢迎比较接近文言的《三国演义》，却不欢迎比较接近白话的《醒世姻缘》《野叟曝言》……文白之争这件事情本身也就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反映。<sup>[46]</sup>

文中提到的语言与社会意识、过去社会的遗产，援用的就是1929年陈望道翻译的《编者言》中谈到

的“批判性的进行文化遗产”以及《社会意识学大纲》之中提到的“语言概念是社会意识的基本要素”“语言，思维，道德，艺术等——全部意特沃罗几，即社会意识”<sup>[47]</sup>的理论脉络。

此外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可能构成陈望道对于“知识分子与共产党、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陈望道所选择翻译的《苏俄文学理论》一文，最后批评托派以及岗位派的理论，而肯定波格丹诺夫理论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基础：

托罗兹基和瓦浪斯基两人底普罗列答利亚文化和文学底否定论，结局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而那从文艺底特殊性底至深的理解中产生的文艺政策论，却完全不错。反之，在哨岗一派对于普罗列答利亚文化底主张（领导权底要求）是不错的，而对于具体的实现的方法（文艺政策）却完全把政治和文艺底关系弄错了。所以，这两面底是非邪正，是要经过那完全继承波格达诺夫理论的卢那卡斯基取舍别择，才能成为党底文艺政策。<sup>[48]</sup>

而党的文艺政策则指出“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底新的具体的进路”：“利用旧的技巧底一切技巧的到达，创出为几百万人们所能理解那样的合适的形式来。”<sup>[49]</sup>当时斯大林派与托派之间的斗争也已延后至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斗争，因此对于托洛斯基的批评与对波格丹诺夫理论的肯定，可说是陈望道另寻出路的尝试，也显现了陈望道对于1930年时党与文艺之间理想的关系的认知。

## 余 论

1929年陈望道根据林房雄的日文版翻译了波格丹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以及冈泽秀虎的《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并且援用了波格丹诺夫“社会意识”“组织”等术语至《修辞学发凡》之内。因为苏俄与我国革命进程的时差，使得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在苏俄与我国有着不同的实践语境。比起苏俄逐渐稳定的革命局势，我国20年代末面临了大革命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失败，因此也迫切需要文化战线理论。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与波格丹诺夫同样身处教育界的陈望道，深知中国的教育尚



未普及的现实，因此把“文化组织社会”理论改写为“语言组织社会”理论，主张先使大众拥有共通的语言。

在1932年时瞿秋白同样思考了组织群众的问题，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当时瞿秋白运用彼时苏俄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家马尔的理论，因此拒绝一切文化遗产，如瞿秋白的《汉字和中国的言语》《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等文，认为“汉字制度的中国文不能代表中国话，它不但不帮助实际言语的发展和进化，反而阻碍它的发展和进化”。陈望道援用波格丹诺夫的社会意识理论，主张从当下的社会意识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通过大江书铺组织党内外知识人，并且将波格丹诺夫的语言组织论运用至大众语运动，开启一条并非完全拒斥传统文化，在左翼之中较为温和的语文改革论。

无论是青野季吉通过列宁所阐发的“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或是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时提出的“文艺与宣传”问题，以及延伸到1931年第三种人论争的“左翼文艺与自由人”，其中都存在着政治与文艺之间的张力。陈望道在1929年吸取了苏俄的经验来反思这些问题，译文提到“布尔什维克改为不再用先前的煽动，而试行在普罗列答利亚大众之间加以有秩序地深的宣传”，在集体方面是要使“普罗列答利亚意特沃罗儿握着领导权”<sup>[50]</sup>，在个人方面是因为“只在传单上，在知的批判上，表面地知道自己，并不能算是真已知道自己的。我们都是从情的领受比知的领受更深刻”。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底政治文化时代）是一切文艺问题底基本问题”，因此只有使普罗文学得以“忠实承受普罗列答利亚底全生活”<sup>[51]</sup>，才能够真正达成普罗文学的理想。通过上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翻译与实践，陈望道确认了在政治与文艺之间，文化调和、连接集体与个人的组织作用。这些理论遗产，直至今日仍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1] 引自陈望道：《致汪馥泉》，《陈望道文存全编》第8卷，第25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21][23][27][29][47] 波格丹诺夫著，林房雄译，陈望道重译：《社会意识学大纲》，第5页，第427页，第3页、第438页，第3页，第68页、第69页、第47页、

第74页，第4页、第75页，大江书铺1929年版。

[3]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第76—7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 姜淑霞：《波格丹诺夫之流与“四人帮”》，《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6月。

[5] 哲之：《列宁同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作斗争的简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6月。

[6] 可参考安启念《如何认识波格丹诺夫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批评》，《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

[7] 胡一峰：《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8] 对此陈望道提及“译时是施先生用力较多。他又已经独立将上文说及的《经济科学》译出，称为《经济科学大纲》，和本书同时印行。遇有本书讲技术的或经济的过程过于简略不易把握要领处，最好参看那本书”。施存统则提及“本书底姊妹篇社会意识学大纲已经由陈望道先生与我共同译出，同在大江书铺出版……读了本书的人再去读社会意识学大纲一定格外有趣”。引自波格丹诺夫著，林房雄译，陈望道重译：《译者序言》，《社会意识学大纲》，第5页。以及波格丹诺夫著，林房雄译，施存统重译：《译者序言》，《经济科学大纲》，第3—4页，大江书铺1929年版。

[9] 在1930年由改造社出版的版本之中，题目加上了副标题改为《社会意识学概论——イデオロギーの科学》。

[10] 萨孟武的版本把原作者译为“波达诺夫”，标题也与原著理论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1] 萨孟武没有谈及译文所据原文。根据其留日背景，以及在1928年至1930年的《新生命》刊物时期主要通过日文翻译经济、法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学》可能主要也是以日文版本为主，但此书所用的封面为德语版标题，是否有参照德语翻译尚待考证。

[12] Ludwig Noiré, 1829—1889。德国语言哲学家，此处波格丹诺夫引用的是他于1885年写作的 *Logos, Ursprung und Wesen der Begriffe*，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1917年英译版为 *The origin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3] 《经济学简明教程》即施存统所译的《经济科学大纲》。书评引自列宁著，中央编译局：《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8年2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 在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1904年夏天和秋天时同波格丹诺夫等几个布尔什维克“达成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25日）》，《列宁全集》第45卷，第181—1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之中批判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对此列宁则是强调权力集中制以及严密的党组织，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引自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199页。

[16] 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 1905年8月6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随即成立议院，但仅有非常有限的权力。1908年至1909年时布尔什维克对于党组织是否参与杜马展开激辩。对此列宁主张“建立党的非法的‘工人委员会’来利用‘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引自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全集》第17卷，第371—37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 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关于两封来信》，《列宁全集》第17卷，第274页。

[19] 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列宁全集》第35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 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决议草稿要点》，《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2] ボグダーノフ著，林房雄訳：「第一版の序」，『社会意識学概論』，第6页，白揚社1927年版。

[24] 姚铁城：《波格达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海青年》1932年第32卷第4期。

[25] 清明：《评“社会意识学大纲”》，《书报评论》1931年第1卷第6期。

[26] 1961年时陈望道回忆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文教战线的工作”，并提到这些工作“比起政治、军事来，至

多是第三战线”。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望道文存全编》第7卷，第26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8]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45—46页、第84页，大江书铺1932年版。

[30] 马龙闪：《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世界历史》，1981年5月。

[31][33][34][36][39][41][42] 陈望道译，冈泽秀虎著：《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3号。

[32] 冈泽秀虎著，陈望道译：《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5号。

[35] 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青年团的任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9页、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50] 冈泽秀虎著，陈望道译：《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8号。

[38] 关于列宁的文艺主张以及在中国的翻译语境，可参考王中忱《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组织化与理论批评的跨国再生产——以冯雪峰翻译列宁文论为线索》，《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40] 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列宁全集》第35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3][44] 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2页，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5] 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文存全编》第7卷，第329页。

[46] 薛凡：《建立大众语文学》，《连环两周刊》第2期，1934年7月6日，第11—12页。

[48][49][51] 冈泽秀虎著，陈望道译：《苏俄文学理论》，第373—374页，第373页，第378页、第515页、第547页，开明书店1933年版。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